

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

——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证据

胡 枫 陈玉宇

(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以及借贷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确实有助于农村家庭获得借贷。有意思的是,与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相比,社会网络似乎对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大。户主年龄对农户获得各类借贷可能性以及借贷额的影响为倒U形,而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所承包耕地数量以及“本村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均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此外,那些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以及户主为女性的农户不太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且贷款额较小,而较为富裕的农户则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较多的贷款。

关键词: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村借贷

JEL 分类号:R51,O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12)12-0178-15

一、引 言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信贷市场发展落后以及农村家庭金融抑制的问题非常普遍(Akoten等,2006;Barslund和Tarp,2008;Tsai,2004)。这种问题的持续存在会对农村家庭从事生产性活动、提高收入与福利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村家庭也面临着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农户的借贷需求仍然远远不能得到满足,甚至出现农村资金外流的现象(何广文,1999;谢平、徐忠,2006)。近年来,一些研究(韩俊等,2007;金烨、李宏彬,2009;李锐、朱喜,2004;钟春平等,2010;周天芸、李杰,2005;Li等,

收稿日期:2012-06-26

作者简介:胡 枫,副教授,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Email: hufeng@manage.ustb.edu.cn.

陈玉宇,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ail: chenyyu@gsm.pku.edu.cn.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03005,71073002,71133003)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研究工作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县域经济和地方金融研究中心赞助和印尼哈利达集团公司的资金支持。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2011)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家庭的借贷活动,并研究影响其借贷需求或供给的因素。

作为一个重视“关系”传统的国家,中国所普遍存在的社会网络会对人们的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Zhang 和 Li(2003)发现,来自亲戚朋友的帮助有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的获取。Zhang 和 Zhao(2011)的研究则表明,那些拥有较广泛社会关系网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从事自我雇佣的活动。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的个人政治身份(如是否为中共党员)与行政职务(如是否担任干部)也可能会为自己与其他家庭成员带来一定的好处(Knight 和 Yueh,2008)。

中国农村的借贷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尤其对于非正规渠道的借贷活动而言。比如,农户之间的借贷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立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与情感,很少以抵押担保或者合同的形式执行(郭斌、刘曼路,2002;何广文,1999;杨汝岱等,2011)。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较少见到关于社会网络(即“关系”)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就我们所知,现有的相关实证文献包括杨汝岱等(2011)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研究农户的民间借贷需求行为以及童馨乐等(2011)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的研究。不过,上述研究并没有区分或单独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而考虑到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渠道的借贷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后果可能并不一样,这种区分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往往会用于生产性用途,从而可能会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Barslund 和 Tarp,2008)。

本文将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来全面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包括来自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渠道的借贷)的影响。该项调查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综合家庭调查,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14795个城乡家庭样本,并提供了关于社会网络与家庭借贷活动方面的丰富信息。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全面考察社会网络对中国农户的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的内容。(2)我们所使用的样本来自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调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这种大样本的分析结果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社会网络在中国农村地区借贷活动中的作用。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说明数据来源,并提供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第三部分介绍实证模型。第四部分为估计结果,包括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可能性以及借贷额的影响,以及稳健性检验。最后为结论部分。

二、数 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0年所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该项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的跟踪调查,旨在通过跟踪调查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样本,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该项目的全国性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共涉及除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和

台湾之外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① 本文所使用数据为 2010 年调查的农村地区样本数据,包括来自 138 个区县和 411 个行政村的 9631 个农村家庭。

该项调查 2010 年的家庭问卷提供了 2009 年家庭借贷方面的有关信息,包括借贷的途径(正规金融机构、亲戚朋友和民间借贷)、各类借贷的具体数额、以及借款或贷款的用途等。^② 基于上述信息我们发现,在所有农村家庭中,有约三分之一(33.12%)的家庭在 2009 年曾通过不同途径借款或贷款。其中,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占 27.93%,民间借贷仅占 5.2%,而来自亲戚朋友的借款达 79.91%。^③ 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仍然主要通过非正规渠道来获得资金,特别是来自亲戚朋友的借款(何广文,1999;金烨、李宏彬,2009;谢平、徐忠,2006;杨汝岱等,2011;Turvey 和 Kong,201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户均借贷额远高于非正规渠道的户均借贷额。

接下来,我们简单比较来自不同渠道的借款或贷款用途之间的区别,结果如表 1 所示。由于部分农户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渠道均获得借贷,我们将全部借贷农户分为 2009 年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借贷的农户与 2009 年仅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借贷的农户。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全部农户借贷排前三位的主要用途依次为:建房或购房、家庭成员治病、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即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目的。进一步将借贷农户细分后发现:除了用于建房或购房之外,那些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户还主要将借款或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和做生意这两类生产性活动;而仅通过非正规渠道借贷的农户排前三位的主要用途依次为家庭成员治病、建房或购房、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上述结果表明,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可能会更多地投资于生产性活动,而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借贷的主要目的

表 1 2009 年农户借贷的用途(%)

	全部借贷农户	曾向正规金融机构 借贷的农户	仅通过非正规渠道 借贷的农户
建房、购房	25.18	31.86	22.59
家庭成员治病	22.84	14.66	26.00
家庭日常生活开支	17.28	13.12	18.88
教育	15.06	13.78	15.56
做生意	9.99	16.32	7.54
农业生产	9.93	19.63	6.18
办大事,如结婚、办丧事等	7.13	4.30	8.23
购买耐用消费品	4.27	3.64	4.52
其他	3.23	2.65	3.45
样本数	3253	907	2346

注:由于农户可能从多种渠道获得借贷,因此各列的百分比之和相加会超过 1。

① 关于本项调查的详细信息,可参考其网站 <http://www.issu.edu.cn>。

② 其中,正规金融机构包括各类银行和信用社;而民间借贷指的是有利息回报的来自非金融机构的借贷,属于非正规渠道借贷。

③ 由于有部分家庭从多种途径获得借款或贷款,因此这三种途径比例之和大于 1。

是为了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与平滑消费。^① 不过,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渠道借贷农户的贷款用途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农户的自身状况存在区别。比如,收入更高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而这些收入高的农户可能会更多地参与生产性活动(金烨、李宏彬,2009)。

最后,该项调查还提供了关于家庭社会网络的相关信息。比如,2010年春节拜访样本家庭的亲戚朋友数量以及样本家庭在2009年的送礼情况等。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农户的社会网络对其借贷活动的影响,因此接下来我们首先简单比较不同类型借贷农户之间的社会网络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与未获得借贷的农户相比较而言,获得借贷的农户的社会网络似乎更强: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量和去年所送出的礼物份数均明显较多。进一步将借贷农户分为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和仅从非正规渠道借贷的农户后发现,前者的社会网络比后者更强一些。其中,前者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数量和去年所送出的礼物份数分别比后者平均多29%和38%。上述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较强的农户似乎更可能获得借贷,尤其更可能获得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

表2 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的获得

	借贷农户			非借贷农户
	全部	正规金融机构	仅非正规渠道	
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	10.13	11.41	9.64	8.76
亲戚	6.37	6.89	6.17	5.80
朋友	3.77	4.51	3.49	2.98
去年送出的礼物份数	17.39	21.70	15.75	13.46
样本数	3048	838	2210	6009

不过,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获得之间的“虚假”相关关系。比如,农村家庭规模越大,其社会网络可能会越强;同时,由于家庭劳动力较多,该家庭可能具有较强的还债能力,从而越可能获得借贷。因此,如果不控制家庭规模这一中介变量,则可能会导致上述“虚假”相关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计量模型进一步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活动的影响。

三、实证模型

本文的目标是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活动的影响。更具体地,我们将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以及所获得借贷额的影响。关于前者,我们将使用二元 Lo-

^① Barslund 和 Tarp (2008)对越南农村家庭借贷行为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gistic 模型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包括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可能性。关于后者,考虑到部分农户的借贷额为零的情形,我们将利用 Tobit 模型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额(包括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影响(Greene, 2008)。^① 具体的简化实证模型如下:

$$Y = S\beta_1 + X\beta_2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Y 为因变量,包括虚拟变量“2009 年农户是否获得借贷”、“2009 年农户是否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2009 年农户是否获得非正规渠道借贷”,包含部分零值的连续变量“2009 年农户的借贷额”、“2009 年农户的正规金融机构借贷额”与“2009 年农户的非正规渠道借贷额”。我们所感兴趣的解释变量是 S ,即样本家庭的社会网络。类似其他文献(杨汝岱等,2011;Knight 和 Yueh,2008;Zhang 和 Zhao,2011)的做法,我们使用“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拜访通常是维系个人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② 解释变量向量(X)则包括受访其他家庭特征和所在行政村的相关信息。

根据其他类似文献(金烨、李宏彬,2009;李锐、李宁辉,2004;杨汝岱等,2011;钟春平等,2010;周天芸、李杰,2005;Akoten 等,2006;Barslund 和 Tarp,2008;Li 等,2011)的做法,我们在家庭特征中包括户主的相关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主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家庭借贷决策方面的风险偏好或者还贷能力。比如,在做金融方面的决策时女性可能更加偏向保守(Jianakoplos 和 Bernasek,1998),而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家庭的还债能力。考虑到年龄对借贷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即那些中年户主更可能获得借贷,我们还在模型中包括户主年龄的平方。同时,我们在模型中包括家庭规模和家庭劳动力数,以反映家庭的人口结构和生产能力。考虑到农业生产对借贷资金的需求,我们在模型中还包括家庭所承包的土地数量。

由于农户可能会将借贷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提高家庭收入,而本文所使用的农村家庭调查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如果在实证模型中控制当年的家庭收入水平,则可能会导致反向因果问题。而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作为家庭最重要的固定财产,住房通常被视为家庭财富的象征(de Brauw 和 Rozelle,2008;McKinley 和 Wang,1992)。因此,我们在模型中

① 关于 Tobit 模型的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考 Greene(2008,第 869—881 页)。

② 此处我们并未使用“去年所送出的礼物份数”作为农户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其原因在于该变量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农户可能由于想获得借贷而向他人送礼,从而导致该变量的系数估计存在反向因果偏误(reverse causality bias)。而由于“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为“拜访样本家庭”的亲戚朋友,并非“样本家庭所拜访”的亲戚朋友,所以其内生性问题可能相对较小。不过,虽然该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内生性问题,模型估计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

并不直接包括家庭的当年收入水平,而是利用“家庭的住房条件”来代表农户的财富状况。^①

最后,考虑到家庭所处村庄的地理位置对农户进行生产性投资或做生意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本村到乡镇政府以及县城的距离。同时,自然灾害等意外事故可能对农户的收入波动造成影响,从而会增加其借贷的需求。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本村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这一虚拟变量,预期该变量对农户借贷获得产生正向的影响。另外,由于各地区的社会文化与借贷习惯差异较大,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省级虚拟变量,以尽可能减少由于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

四、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计量分析

在本部分,我们将分别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可能性与借贷额的影响。具体地,我们将首先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获得非正规借贷可能性的影响,然后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户所获得的全部借贷额、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额以及来自非正规渠道的借贷额的影响。

(一) 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可能性的影响

如表3的第1至第3列所示,“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具有正向的影响,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确实有助于农村家庭获得借贷。即使在控制了行政村相关变量以及省级虚拟变量的情况下,这种正向影响仍然在统计上显著。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亲戚之间在春节期间的相互拜访可能是一种必要的礼节,并不一定能说明该家庭的社会关系的强弱。即使亲戚之间关系不是特别好,按照礼仪也可能必须相互拜访;而朋友之间的拜访则不会受这种礼仪的约束。^②因此,我们利用另外一个可能更合适的变量“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数”来代表家庭社会网络,结果如表3的第4至6列所示。我们仍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户获得借贷。上述结果与杨汝岱等(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

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的是,户主年龄与家庭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即那些中年户主家庭更可能获得借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借出者对申请借贷家庭还债能力的判断,或者说明中年户主家庭所面临的资金需求更大(金烨、李宏彬,2009)。另外,那些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和户主为女性的家庭获得借贷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

^① 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包括了关于家庭的住房面积以及住房类型的相关信息,但由于这些信息的缺失值较多,我们这里利用访问员对样本家庭住房条件的判断(基于七分Likert量表)。需要注意的是,农户可能会将借贷用于改善住房条件,从而造成反向因果问题。不过,在现有数据中我们不能找到衡量家庭财富更好的指标,因此在后面的实证结果中我们仍然会使用该项指标。有鉴于此,关于本文的相关结果读者需要谨慎解读。另外,我们也尝试在模型中加入“家庭收入”来替代“家庭住房条件”变量,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列出相应的结果。想了解该结果的读者可直接与本文作者联系。

^② Zhang和Zhao(2011)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认为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可能会比亲戚所带来的帮助更大。

反映了这些家庭的风险态度相对较为保守(金烨、李宏彬,2009)。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家庭所承包耕地数量均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家庭住房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

最后,如我们所预期的是,“本村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这一虚拟变量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这表明,自然灾害频发会对农业生产以及其他生产性活动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农户通过借贷一方面可以平滑由此所造成的家庭消费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借贷来扩大生产以弥补相应的损失。

表 3 社会网络与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全部借贷

	(1)	(2)	(3)	(4)	(5)	(6)
<u>社会网络:</u>						
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	0.007 *** (0.002)	0.007 *** (0.002)	0.005 * (0.002)			
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数				0.012 *** (0.004)	0.012 *** (0.004)	0.009 ** (0.004)
<u>家庭特征:</u>						
户主年龄	0.063 *** (0.014)	0.063 *** (0.014)	0.059 *** (0.014)	0.063 *** (0.014)	0.063 *** (0.014)	0.059 *** (0.014)
户主年龄的平方/100	-0.098 *** (0.015)	-0.097 *** (0.015)	-0.09 *** (0.015)	-0.097 *** (0.015)	-0.096 *** (0.015)	-0.09 *** (0.015)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33 *** (0.006)	-0.03 *** (0.006)	-0.024 *** (0.006)	-0.033 *** (0.006)	-0.03 *** (0.006)	-0.024 *** (0.006)
女性户主	-0.016 (0.055)	-0.015 (0.056)	-0.004 (0.057)	-0.021 (0.055)	-0.019 (0.055)	-0.006 (0.057)
家庭规模	0.129 *** (0.014)	0.12 *** (0.014)	0.095 *** (0.015)	0.13 *** (0.014)	0.121 *** (0.014)	0.095 *** (0.015)
家庭劳动力数	0.034 (0.022)	0.044 ** (0.022)	0.053 ** (0.022)	0.034 (0.022)	0.044 ** (0.022)	0.053 ** (0.022)
家庭住房条件	-0.019 (0.017)	-0.01 (0.017)	0.005 (0.018)	-0.017 (0.017)	-0.008 (0.017)	0.005 (0.018)
家庭承包土地	0.011 ** (0.005)	0.008 * (0.005)	0.005 (0.004)	0.011 ** (0.005)	0.009 * (0.005)	0.005 (0.004)
<u>村庄特征:</u>						
离乡镇政府的距离		-0.0001 (0.003)	-0.003 (0.003)		-0.0001 (0.003)	-0.003 (0.003)
离县城的距离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		0.372 *** (0.052)	0.31 *** (0.054)		0.372 *** (0.052)	0.31 *** (0.054)
省级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数	8884	8884	8884	8884	8884	8884

注:①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②***、**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所有结果均为稳健性方差下的模型结果;④未报告常数项的结果。

(二) 社会网络对农户分别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可能性的影响

不过,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不同渠道借贷的可能性影响可能不同。比如,由于非正规渠道的借贷(如亲戚朋友)更多地建立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与情感,社会网络可能会对来自非正规渠道的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非正规渠道借贷可能性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有意思的是,与向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相比,社会网络似乎对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影响更大。这一有趣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除了相应的贷款抵押或者担保之外,“关系”同样会对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正规金融机构在作出是否贷款的决定时会考虑到贷款人的信用及其社会关系等(Akoten等,2006)。另一方面,对于非正规渠道借贷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签合同或抵押,这种借贷发生的主要基础是借贷者与借出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与私人关系(郭斌、刘曼路,2002;何广文,1999;Turvey和Kong,2010)。因此,社会网络的广泛性(即“亲戚朋友的数量”)对是否能获得非正规借贷可能影响并不大,而更为重要的可能是社会网络的质量(即“与亲戚朋友关系的紧密程度”)(Demir和Weitekamp,2007;Fiorillo和Sabatini,2011)。^①另外,即使对于非正规渠道的借贷活动,朋友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包括亲戚在内的社会网络,这似乎与人们的直观感受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而言,亲戚之间的信任程度应该更强,即亲戚的借贷应该更为优先。我们对此的解释为,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亲戚之间在春节期间的相互拜访可能是一种必要的礼节,并不一定能说明该家庭的社会关系的强弱,而朋友之间的互访则更能传递出“关系较强”的信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前文中还利用“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数”来代表家庭社会网络的原因。

与前面的结果类似,户主年龄对获得各类借贷的影响为倒U形,即那些户主年富力强的农户更容易获得借贷。同时,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本村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均对农户获得各类借贷的可能性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以及户主为女性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非正规渠道借贷,而较少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借贷渠道对农户还债能力的要求,即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户主为女性的农户可能还债能力相对较弱,往往较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Akoten等,2006;Li等,2011)。同时,代表家庭财富水平的“家庭住房条件”越好,则越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而那些较穷的农户则倾向于通过非正规渠道借贷。这进一步反映了正规金融机构对发放贷款对象的严格选择,即那些较为富裕的农村家庭才可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金烨、李宏彬,2009;Turvey和Kong,2010)。最后,我们还发现家庭所承包耕地数量均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可能性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非正规渠道借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

^① Demir和Weitekamp(2007)与Fiorillo和Sabatini(2011)的研究均表明,社会网络的质量比其规模对个人幸福感以及自我评估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不过遗憾的是,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并没有包括关于社会网络质量的相关信息,从而不能对我们的上述猜想加以验证。

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即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主要用途之一为农业生产。

表 4 社会网络与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渠道(Logistic 模型结果)

	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非正规渠道借贷	
	(1)	(2)	(3)	(4)
<u>社会网络:</u>				
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	0.007 [*] (0.003)		0.003 (0.002)	
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数		0.012 ^{**} (0.006)		0.007 [*] (0.004)
<u>家庭特征:</u>				
户主年龄	0.086 ^{***} (0.026)	0.085 ^{***} (0.026)	0.047 ^{***} (0.015)	0.047 ^{***} (0.015)
户主年龄的平方/100	-0.109 ^{***} (0.027)	-0.109 ^{***} (0.027)	-0.076 ^{***} (0.015)	-0.076 ^{***} (0.015)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15 (0.01)	0.016 (0.01)	-0.026 ^{***} (0.007)	-0.026 ^{***} (0.007)
女性户主	-0.171 [*] (0.097)	-0.175 [*] (0.097)	0.047 (0.058)	0.047 (0.058)
家庭规模	0.06 ^{**} (0.025)	0.06 ^{**} (0.025)	0.093 ^{***} (0.016)	0.092 ^{***} (0.016)
家庭劳动力数	0.091 ^{**} (0.036)	0.091 ^{**} (0.036)	0.068 ^{***} (0.023)	0.068 ^{***} (0.023)
家庭住房条件	0.136 ^{***} (0.029)	0.137 ^{***} (0.029)	-0.042 ^{**} (0.019)	-0.043 ^{**} (0.018)
家庭承包土地	0.008 ^{**} (0.004)	0.008 ^{**}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u>村庄特征:</u>				
离乡镇政府的距离	-0.003 (0.005)	-0.003 (0.004)	-0.001 (0.003)	-0.001 (0.003)
离县城的距离	0.001 (0.002)	0.001 (0.002)	0.0003 (0.001)	0.0003 (0.001)
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	0.206 ^{**} (0.091)	0.207 ^{**} (0.091)	0.276 ^{***} (0.056)	0.276 ^{***} (0.056)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8884	8884	8884	8884

注:①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②***、**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所有结果均为稳健性方差下的模型结果;④未报告常数项的结果。

不过,由于农户可能同时从多种渠道获得借贷,简单利用两个二元 Logistic 模型来分别研究社会网络对不同渠道借贷可能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偏误;这两个模型的误差项之间

可能相关。因此,接下来我们利用考虑方程误差项之间可能相关的双变量 Probit 模型 (Biprobit) 来研究社会网络对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渠道借贷可能性的影响。^①

如表 5 底部所示,两个二元离散选择模型误差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5,该相关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简单利用两个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来分别估计社会网络对不同渠道借贷可能性的影响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偏误。在考虑到这种偏误后,与表 4 的结果相比较而言,社会网络对不同渠道借贷可能性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统计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类似地,其他变量对不同渠道借贷可能性的影响程度也相应减小,但统计显著性亦未发生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社会网络与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渠道 (Biprobit 模型结果)

	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非正规渠道借贷	
	(1)	(2)	(3)	(4)
<u>社会网络:</u>				
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	0.004 ** (0.002)		0.002 (0.002)	
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数		0.007 ** (0.003)		0.004 * (0.003)
<u>家庭特征:</u>				
户主年龄	0.041 *** (0.013)	0.041 *** (0.013)	0.024 *** (0.008)	0.024 *** (0.008)
户主年龄的平方/100	-0.053 *** (0.013)	-0.052 *** (0.013)	-0.041 *** (0.009)	-0.041 *** (0.009)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09 (0.005)	0.009 (0.005)	-0.016 *** (0.004)	-0.016 *** (0.004)
女性户主	-0.091 * (0.049)	-0.093 * (0.049)	0.029 (0.035)	0.029 (0.035)
家庭规模	0.033 ** (0.013)	0.033 ** (0.013)	0.057 *** (0.009)	0.057 *** (0.009)
家庭劳动力数	0.045 ** (0.019)	0.046 ** (0.019)	0.04 *** (0.014)	0.04 *** (0.014)
家庭住房条件	0.066 *** (0.015)	0.067 *** (0.015)	-0.024 ** (0.011)	-0.025 ** (0.011)
家庭承包土地	0.005 ** (0.002)	0.005 **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① 关于双变量 Probit 模型的具体细节可参考 Greene(2008,第 817~826 页)。周天芸、李杰(2005)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对农户的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活动和非正规渠道借贷活动进行了分析。

续表				
	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非正规渠道借贷	
	(1)	(2)	(3)	(4)
村庄特征:				
离乡镇政府的距离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离县城的距离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3 (0.001)	0.0003 (0.001)
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	0.132 *** (0.047)	0.133 *** (0.047)	0.166 *** (0.033)	0.167 *** (0.033)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误差项之间的相关系数	0.15 ***		0.15 ***	
方程独立性的 Wald 检验:chi2(1)	33.43		33.31	
样本数	8884		8884	

注:①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②***、**和* 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③所有结果均为稳健性方差下的模型结果;④未报告常数项的结果。

(三) 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额的影响

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包括社会网络在内的上述因素对农户借贷额的影响,以了解这些因素是否仍然会产生类似的作用。考虑到大部分农户并没有借贷,即农户借贷额中存在较多的零值,我们使用 Tobit 模型来处理上述问题。与前面的研究结果类似,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额具有正向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对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而言似乎更大。关于其他变量的结果也非常类似:户主年龄对农户各类借贷额的影响为倒 U 形,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所承包耕地数量以及“本村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均对农户借贷额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以及户主为女性的农户所能够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较少,而较为富裕的农户获得较多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表 6 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额的影响

	全部借贷额		正规金融机构借贷额		非正规渠道借贷额	
	(1)	(2)	(3)	(4)	(5)	(6)
社会网络:						
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	0.028 ** (0.013)		0.055 * (0.028)		0.018 (0.015)	
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数		0.059 *** (0.023)		0.109 ** (0.049)		0.048 * (0.025)

续表						
	全部借贷额		正规金融机构借贷额		非正规渠道借贷额	
	(1)	(2)	(3)	(4)	(5)	(6)
家庭特征:						
户主年龄	0.364 *** (0.081)	0.362 *** (0.081)	0.66 *** (0.195)	0.654 *** (0.195)	0.306 *** (0.09)	0.305 *** (0.09)
户主年龄的平方/100	-0.543 *** (0.083)	-0.54 *** (0.083)	-0.84 *** (0.201)	-0.833 *** (0.201)	-0.483 *** (0.092)	-0.481 *** (0.092)
户主受教育年限	-0.124 *** (0.037)	-0.125 *** (0.037)	0.147 * (0.083)	0.146 * (0.083)	-0.152 *** (0.042)	-0.154 *** (0.042)
女性户主	-0.058 (0.324)	-0.066 (0.324)	-1.475 * (0.763)	-1.501 ** (0.762)	0.236 (0.363)	0.236 (0.362)
家庭规模	0.567 *** (0.086)	0.566 *** (0.086)	0.458 ** (0.199)	0.456 ** (0.199)	0.6 *** (0.096)	0.597 *** (0.096)
家庭劳动力数	0.325 *** (0.126)	0.327 *** (0.126)	0.774 *** (0.287)	0.782 *** (0.287)	0.427 *** (0.143)	0.427 *** (0.143)
家庭住房条件	0.138 (0.1)	0.137 (0.1)	1.066 *** (0.23)	1.07 *** (0.23)	-0.153 (0.113)	-0.158 (0.113)
家庭承包土地	0.03 * (0.018)	0.031 * (0.018)	0.069 ** (0.028)	0.069 ** (0.028)	0.027 (0.019)	0.027 (0.019)
村庄特征:						
离乡镇政府的距离	-0.019 (0.018)	-0.019 (0.018)	-0.024 (0.036)	-0.024 (0.036)	-0.013 (0.02)	-0.013 (0.02)
离县城的距离	0.008 (0.007)	0.009 (0.007)	0.009 (0.015)	0.009 (0.015)	0.002 (0.008)	0.002 (0.008)
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	1.745 *** (0.303)	1.746 *** (0.303)	1.862 *** (0.712)	1.87 *** (0.712)	1.734 *** (0.34)	1.735 *** (0.34)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8840	8840	8882	8882	8847	8847

注:①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②***、**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所有结果均为稳健性方差下的模型结果;④未报告常数项的结果。

(四) 稳健性检验: 家庭政治资本与借贷行为

除了使用“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来度量农户的社会网络之外,我们接下来尝试加入其它可能的代理变量,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比如,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的家庭政治资本(包括家庭成员的政治身份与行政职务)也可能为农村家庭的经济活动带来一定的好处(Knight 和 Yueh,2008;Zhang 和 Li,2003)。因此,在本文所使用的 CFPS 数据基础上,我们构建了“家庭成员中的中共党员数”与“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干部”这两个变量,并将其加入到本文第三部分的实证模型(1)中。^①

在加入家庭政治资本变量后,相关结果与前面的表 3 与表 5 所示结果类似。^②虽然相应的回归系数有所减小,但以“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或“春节期间来访的朋友数”所代表的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仍具有正向的影响,且与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相比,社会网络似乎对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家庭成员中的党员数与是否有干部均对农户的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可能性有正向的影响,且前者的影响在 1% 的水平显著。不过,家庭政治资本对于农户的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似乎没有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在我国当前金融发展较落后以及相关制度尚不健全的状况下,家庭的政治关系可能会有利于其获取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但由于非正规借贷主要基于借贷者与借出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与私人关系,可能与家庭的政治资本关系并不大。

五、结 论

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农户提高收入和福利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作为一个重视“关系”传统的国家,中国农村的借贷活动也通常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利用 2010 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全面系统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包括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以及借贷额)的影响。考虑到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不同渠道借贷可能性的影响的不同,我们还进一步分别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渠道借贷的可能性以及借贷额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以及借贷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我们分别考察对不同渠道借贷活动的影响时发现,与向非正规渠道借贷活动相比,社会网络似乎对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活动影响更大。这一结论似乎与人们的直觉不太相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在中国的农村地区,除了相应的贷款抵押或者担保之外,“关系”同样会对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非正规渠道借贷而言,其主要基础是借贷者与借出者之间的信任程度,因此社会

^① 此处“家庭成员中的干部”是指在各类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国有企业以及村委会中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家庭成员。

^②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列出加入家庭政治资本后的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可能性以及借贷额影响的结果。想了解该结果的读者可直接与本文作者联系。

网络的广泛性(即“亲戚朋友的数量”)对非正规借贷行为可能影响并不大,而更为重要的可能是社会网络的质量(即“与亲戚朋友关系的紧密程度”)。

另外,户主年龄对农户获得各类借贷的可能性以及借贷额的影响为倒 U 形,而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所承包耕地数量以及“本村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均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与借贷额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那些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以及户主为女性的农户不太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且数额较小,而较为富裕的农户则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较多的贷款。

上述研究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仍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对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获得借贷资金,进而提高家庭收入和增进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网络还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促进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那些收入较低、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户主为女性的农户往往较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会对农村地区减贫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如何通过农村金融创新来覆盖这部分弱势群体,也应该成为相关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虽然我们使用“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来代表农户的社会网络以尽量减少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但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估计偏误。另外,由于受数据限制,我们并不能深入研究社会网络的质量,从而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社会网络对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行为的影响要大于对向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的影响。上述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郭斌、刘曼路,2002:《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 10 期。
- [2] 韩俊、罗丹、程郁,2007:《信贷约束下农户借贷行为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 2 期。
- [3] 何广文,1999:《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中国农村经济》第 4 期。
- [4] 金烨、李宏彬,2009:《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借贷行为》,《金融研究》第 4 期。
- [5] 李锐、李宁辉,2004:《农户借贷行为及其福利效果分析》,《经济研究》第 12 期。
- [6] 童馨乐、褚保金、杨向阳,2011:《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八省 1003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金融研究》第 12 期。
- [7] 谢平、徐忠,2006:《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贵州省及其样本县的调查分析》,《经济研究》第 4 期。
- [8] 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2011:《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 11 期。
- [9] 钟春平、孙焕民、徐长生,2010:《信贷约束、信贷需求与农户借贷行为:安徽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 11 期。
- [10] 周天芸、李杰,2005:《农户借贷行为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 11 期。
- [11] Akoten, John E., Sawada, Yasuyuki, and Otsuka, Keijiro (2006). The Determinants of Credit Access and Its Impacts o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The Case of Garment Producers in Keny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4(4): 927 ~ 944.
- [12] Barslund, Mikkel, and Tarp, Finn (2008): Formal and Informal Rural Credit in Four Provinces of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4(4): 485 ~ 503.

- [13] de Brauw, Alan, and Rozelle, Scott (2008).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2): 320 ~ 335.
- [14] Demir, Melikşah, and Weitekamp, Lesley (2007). I a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 Friendship and Personality as Predictors of Happines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8(2): 181 ~ 211.
- [15] Fiorillo, Damiano, and Sabatini, Fabio (2011).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Rol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in Self - Reported Individual Healt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3(11): 1644 ~ 1652.
- [16] Greene, William H. (2008). *Econometric Analysis (6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 [17] Jianakoplos, Nancy Ammon, and Bernasek, Alexandra (1998). Are Women More Risk Averse? *Economic Inquiry*, 36(4): 620 ~ 630.
- [18] Knight, John, and Yueh, Linda (2008).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6(3): 389 ~ 414.
- [19] Li, Xia, Gan, Christopher, and Hu, Baiding (2011). Accessibility to Microcredit by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2(3): 235 ~ 246.
- [20] McKinley, Terry, and Wang, Li Na (1992). Housing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2): 195 ~ 211.
- [21] Tsai, Kellee S (2004). Imperfect Substitutes: The Lo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l Finance and Microfinance in Rural China and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32(9): 1487 ~ 1507.
- [22] Turvey, Calum G. , and Kong, Rong (2010): Informal Lending amongst Friends and Relatives: Can Microcredit Compete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4): 544 ~ 556.
- [23] Zhang, Junfu, and Zhao, Zhong (2011). Social - Family Network and Self -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emporary Rural -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5446.
- [24] Zhang, Xiaobo, and Li, Guo (2003).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2): 315 ~ 331.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rural credit in China using the data of 2010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Our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network has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oth the access to rural credit and the amount of acquired credit. Interestingly, social network seems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access to formal credit than to informal credit. The householder age has inverted U - shaped effects on both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credit, while household size, labor resources, land, and living in the village frequently hit by natural disasters all exert positive effects. In addition, those rural households with less education or female - headed households are less likely to obtain formal credit, whilst rich households tend to obtain more credit from 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Informal credit, Rural credit

(责任编辑:李景农)(校对:LN)